

共同呵护网络舆论场

纪玉



今日论语

门槛低、传播快、范围广、互动强,网络横跨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独特的舆论场,“气场”不容小觑。网络为公众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也是一柄舆论监督的利器,相当一部分贪污腐败、侵害公民权益、滥用政府权力的线索,都来源于网络。特别是微博出现后,网络舆论场更趋活跃和多元。

对于网络,对于微博,一些政府部门和部分官员也曾经感到陌生、不习惯,但现在他们已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舆论场中来了。例如,“上海发布”官方微博善用网络语言发布信息、与网民交

流,就很具有亲和力,既推动了政务公开的脚步,也拉近了政府和公众的距离。上海今年还将推动各区县、委办局全部开设微博。可以说,网络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起着可观的正面推动作用。

这样的舆论场,是值得好好珍惜和保护的。然而,就像有阳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样,网络世界中也有着不少负面因素,比如谣言、炒作、网络暴力。近期,一些在网上编造、传播谣言的个人和网站,受到依法处理,再次提醒我们,畅所欲言也有法律边界。造谣、传谣是对网络公信力的消耗和伤害,尤其是那些造成大面积传播的谣言,往往在一场喧嚣之后留下一地鸡毛,令人们在使用网络时,心中多了重重问号,

甚至让部分人产生了“网络上的东西全不可信”的感觉。

对网络全盘否定未免偏激,不过,面对网络信息时多一些保留而非全盘接受,并不是坏事。制造谣言者、故意传播谣言者,应该是极少数,其他人是在无意中扩散了谣言。但在一次次的造谣、辟谣的过程中,相信不少人都会更谨慎地对待网络信息,对其真假有所甄别。就像现在在很多人都能分辨出网络炒作一样,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警惕性也在提高。

遵守法律,谨慎甄别,理性发声,就是每个人保护网络舆论场的最好方式。网络是很多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网络变成一个谣言满天飞或鸦雀

无声的地方。对于网络较为开放、宽松的舆论环境,每位公民要做的,不仅仅是受惠,更要努力维护。

应该说,网络中不同意见相互碰撞,本身就有去伪存真的作用,因而保持网络的开放性非常重要。但每个人甄别真假的能力不同,而一些大面积流传的谣言,或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或是契合人们内心的某种忧虑和关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时候,需要媒体和意见领袖承担起核实事实、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

当然,政府也有责任发布权威信息、提供真实情况。政府若在公共问题上失语,不啻一种失职。网络舆论场,需要身处其中的政府和公众共同呵护。



新民随笔

明星微博何以受追捧?

张晓然

我的岳父曾是大学教授,不守旧,是个潮人。他注册了三个微博,每天都写,想把肚子里的学问与网友共享。岂料,至今没有一个粉丝而明星就不同了,姚晨的微博,粉丝有1400万,小S有1200万,周立波也有上千万之多。明星微博何以受追捧?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里说,民众对明星博客狂热的首要原因是“极大地满足了网民的窥私欲”,他们从明星们自曝恋情、才艺写真的字里行间、图片画册中,获取情色与隐私。但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几千万粉丝,不可能都怀有这种“窥私”病态。

大量的粉丝年纪很轻,阅历较浅,文化营养不足,我认为他们上微博追星首先是想寻求精神的“加注站”。他们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拥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成功偶像,无疑是找到了一种强劲的精神支撑,从而获取生活的力量。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是一种明星成就感的转移,明星的成功,幻化到粉丝身上,从而呈现“精神输血”效应。

其次,是娱乐心态的共鸣。网络一代青年人体验艺术的方式和美学趣味,基本以娱乐为切入点。尤其是非职业性的随意、颠覆性的叛逆,在恶搞与戏说中将严酷的现实加以隐匿。比如,同济学者批评周立波作为达人秀评委缺少文化不称职,周立波随即在其微博上粗口反击,成为其粉丝的游戏狂欢。明星往往成为粉丝粗鄙宣泄的“代言人”。

还有不少粉丝对与切身利益有关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强烈的表达意愿,然而他们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于是他们就依附明星,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号召力传播自己的话语。“微博女王”姚晨去年9月转发了甘肃省古浪一个村子1万吨优质马铃薯滞销的微博,被转发11500余次后,马铃薯马上卖完。网络盛典上姚晨获“一呼百应奖”后,她说“比起‘一呼’,‘百应’更重要”。

在明星微博当道的网络中,尽管目前文化修养的需求尚不占优势,但教授们要耐得住寂寞,在呼唤网络理性、道德、自律的呼声中,这个140字的平台,学者专家们将来会大有用武之地。



媒体观点

人民日报《给利益博弈套上法治缰绳》:防止建设高峰期成为矛盾高峰期,需要从法治完善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夯实基础。让行政机关、被征收人等利益相关方习惯法律的审视,遵守法律确定的边界,是实现和谐拆迁的唯一保障。(徐立凡)

青年时报《怎样预防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一方面,要强化对统计腐败的惩治力度,不仅要追究其行政方面的责任,更要追究其刑事上的责任。另一方面,必须尽快改革“官出数字”的统计体制和“数字出官”的官员评价体制。(若夷)

京华时报《校车条例构筑儿童上学安全通道》:科学立法只是构筑儿童上学安全通道的基础性工序,良好法治秩序的形成,最终还依赖于对法规制度的严格执行,缺乏权威性的执法就很难达到立法当初所设想的秩序目标。(傅达林)



观点圆桌

“替母道歉”的女孩上了堂公德课

新闻焦点:据长江日报报道,日前河南焦作一名小女孩坐公交时脚被车门夹住,其母知道后赶到并粗暴地扇了女司机一个耳光,小女孩赶紧向司机鞠躬致歉。

宽容不应是“奢侈品”

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宽容不应是成人社会的“奢侈品”?信任的缺失,使得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要么蜷缩一隅,要么以刺相向,而不少孩子的品行,却显得简单而美好。木须虫

看到善才能巩固善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从儿童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要善于看到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他们身上所有好的东西。九岁女儿鞠躬替母道歉显然需要赞扬,看到善才能巩固善。钱兆成

处理冲突是智慧

这位年仅9岁的小女孩,用她的真诚鞠躬和道歉,打动了社会公众,也用她在学校中学到的行为准则,给她的母亲好好上了一堂公民公德课。处理冲突是智慧,父母理应以身作则,教会孩子。毕晓哲

阶梯电价保公平须让百姓充分发言



新民网论

上海市发改委近日发布公告称,拟于5月上旬组织召开本市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式电价听证会。本次听证会将由19名人员构成,其中包括8名消费者。

根据此前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方案,实施阶梯电价后,80%的居民家庭电价保持稳定,其他的则要多缴电费。目前国家已授予地方确定各档次用电标准之权,并明确要求具体方案经过听证后才能出台实施。因此上海居民家庭会不会“被20%”,关键要看地方的阶梯电价方案能否充分考虑民生,做到公平合理;也取决于听证会能否充分体现民意,不走过场,当好政策公平把关人。

比如人口多的家庭用电量自然也大,那么是否应该考虑把人均用电量而不是家庭用电总量作为电价划档标准。再比如上海冬季、夏季用电量比春秋两季大得多,同样应有不同季节的差别化用电量划档标准,才更符合上海市民的正常生活习惯。还有,既然阶梯电价的主要目的是节能减排,那么对用电量少的居民家庭,是否应该降低电价。这些问题,都需要开门讨论,让百姓充分发言,而不是少数人闭门造车。

最关键的是,在阶梯电价形成

初步方案后、开听证会之前,必须预留充裕时间,多渠道、大范围地公开征询民意。让百姓和社会各界有充分的发言权,对方案提出批评和建议,要让阶梯电价方案经得起全体市民的检验。

小小电价牵动千家万户,希

望上海的阶梯电价听证会既推动社会公平与环保,也成为民意得到更大尊重、百姓发言权有效扩大的阶梯。

(作者:新民网评论员。原文刊载于新民网,本版有删节。网址www.xinmin.cn)



高价月嫂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月嫂的最高收入已超过一
万五千元,远高于经过多年专业培训的医学博士,月嫂
的收入是否“贵得离谱”?

郑辛遥画

学生的“官念”与老师的“观念”

陈方



自由谭

大学毕业10多年,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大学了。

前几天和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聊天,朋友感慨,现在的大学生对老师的称呼越来越“社会化”了。只要老师带个一官半职,学生准称呼其官职。比如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系里的主任,打招呼的时候准是“主任好”而非“老师好”。朋友说,他除了上课,还兼职班主任。在学生眼里,班主任也是“官”,学生们见了他们都是称呼“班主任”。

10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无论是上课的还是做行政工作的,哪怕只是个辅导员,我们统统称呼其“老师”。老师的行政职务和学生是没有

关系的,在学生心目中,上课的老师形象如何,不在于他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他课讲得好,那就是好老师;院系里做行政工作的老师形象如何,取决于他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照看得如何,而非他是书记还是主任。

那位朋友也说不清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如果一位老师是教授也是主任,他更喜欢哪种称呼;我只是惊讶于学生的这种变化,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老师的“官衔”,是为了满足老师的虚荣心和满足感,还是在学生心目中系主任的地位远远高于教授的身份?

在大学校园里,学生的“官念”被强化了,或许这是世俗社会里官本位思想对他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这是大学行政化多年辐射的效果。学生的“官念”在变,一

些老师的“观念”同样在变。

朋友所在的大学是一所省属重点院校,最近正在迎接上级评估,学校加重了学生对老师考评的分量。学生对老师的考评机制存在多年,只是现在的权重加强了。学校里的一些老师囿于学生考评的压力,有时候会故意去讨好学生,最夸张的是,有时候上课前老师还会给学生带一些零食。朋友说,一味地讨好学生有时候感觉会丧失一部分为师尊严,所以他重新打量大学教师的身份。

如今的大学学费不菲,学生花那么多钱来上学,教师必须提供学生满意的服务。朋友说,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他总觉得自己“高”学生很多,“高高在上”地上课,学生们未必吃这一套,现在他把自己定位于“服

务员”的角色。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即可。

可是,学生满意的服务,未必就一定是高质量的“产品”啊?学生希望学习压力越小越好,学生希望考试课题越简单越好,老师为了遵从学生的意愿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在学业上的要求。老师是服务员,学生是顾客,这就好比在一家餐厅里,服务员当然要照顾客人的感受。当然有些顾客来餐厅吃饭,可能是冲着享受餐厅的服务来的,可是对于餐厅来讲,饭菜的质量总是最为本质的东西。我能理解朋友对于大学教师身份观念转变的表述,但是,老师真的是服务员吗?

学生的“官念”强了,老师的“观念”变了,我心目中的大学越来越远了。